

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业化思想与实践探析

王丹莉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西城 100009)

【摘要】从中共一大提出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的纲领,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以“国家完全独立”为前提竭力促进工业发展、重要经济命脉实行国有的主张,再到抗日战争时期“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思想,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未来工业发展和工业化的目标。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领导工业生产实践中重视工业自给、统一计划、全民动员、发展国营工业等要素,而这些要素恰恰是后来新中国工业化建设中的鲜明特征。这些早期探索与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亦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探索。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式现代化;早期工业化;工业自给

【中图分类号】 D231;F4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0351(2024)01-0034-08

DOI:10.16223/j.cnki.cn61-1456/c.2024.01.003

引言

鸦片战争以后,为了自强发展、救亡图存,中国人对于发展实业、工业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涌现出了各种各样推进中国实业发展的思想与方案。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在20世纪初期,以大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为基本内涵的工业化思想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 29}。社会思潮中大量关于推动实业发展的言论与主张,代表着中国人对于发展方向与目标的思考,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却需要漫长的、艰辛的探索。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基础薄弱、资源匮乏的条件下启动并加速自身的工业化进程,这成为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20世纪中国共产党完成的一项重要历史任务是全面启动并快速推进了中国的工业化,使中国由一个贫困落后的传统农业国逐步转变成为一个有着独立且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工业国。有关工业化的思想及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中最值得梳理的问题之一。近年来很多学者都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全面而深入的探讨^①。但总体而言,已有研究成果关于中国共产党工业化思想与实践的讨论多以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化进程为重点,而对1949年以前的讨论则相对较少,仅有少量以某一时期、某一区域或某一产业为研究重点的成果^②。提及新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发端,人们可能首先会想到1949年以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以及以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特征的经济运行机制。然而,这一工业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其深刻的历

【收稿日期】 2023-12-16

【作者简介】 王丹莉,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重大项目“新中国工业化进程与举国体制研究”(2021mgczd008)。

史原因与逻辑。本文尝试回溯和梳理 1949 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关于推动工业发展的早期主张与实践,这种回顾有助于我们形成对中国共产党有关工业化的思想以及新中国工业化历程的全景式认识,1949 年以后的工业化目标和发展方式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些早期思想与实践合乎逻辑的延续。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高度关注中国的工业化问题,其关于工业化的目标日益清晰和完善。与当时存在的各种工业化方案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业化理想从一开始就与社会主义道路紧密联系在一起。追求国家独立前提下的“兼程并力社会共营”,是中共早期领导人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提出的明确主张,这一主张已部分地反映出赶超的工业化诉求。对于国家独立进而对于不依附于外国资本的独立工业体系的强调,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工业化推进方案在制度选择、组织方式等层面都表现出自己的特点。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与环境约束条件下,根据地、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实践表现出对工业自给、统一计划、全民动员、发展国营工业等方面的高度重视,而这些要素恰恰成为后来新中国工业化建设中最鲜明的特征。

一、“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社会主义理想下的工业化

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不乏关于工业化的思考和探索,并意识到在中国大力推进实业发展的重要性。不同于其他工业化方案,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工业化实现路径的设想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理想紧密相关,并强调国家的“完全独立”。以此为前提,中国共产党的工业化推进方案在制度选择、组织方式、依靠力量以及发展模式上都逐渐表现出一些自己的特点。

1920 年,陈独秀在发表于《新青年》的文章中强调,“有心改造中国之人都早已感觉着发展教育及工业是顶重要的事”^{[2] 82}。他提出,“救济中国断不能不发展实业,但采用在欧美已经造成实业界危机的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国实业,未免太无谋了”^{[2] 126};要避免西方世界资本私有所引发的阶

级分化与生产过剩造成的经济危机,“只有采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2] 118}。陈独秀认为,中国要发展工业,就“必须使重要的工业都是社会的,不是私人的。如此中国底改革才得的着西洋工业主义的长处,免得他们那样由资本主义造成经济危殆的短处”^{[3] 41}。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过程中,陈独秀高度赞扬俄国所进行的社会主义生产方法试验,并鲜明地提出应当“一切生产工具都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权都归劳动者执掌”^{[2] 77}。陈独秀眼中的社会主义制度,简而言之在于两点:“资本集中”与“财产公有”,如果将财产的私有转变为公有,那么“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分配方法便完全改变了”^{[3] 291}。

同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和领导人李大钊同样看到了中国手工工业、家庭工业根本无力“和国外的机械工业、工厂工业竞争”的窘境,看到了国外工业经济对于中国农业经济的压迫^{[4] 437-438},并提出“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的论断。在李大钊看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改变中国资本“零碎散乱”的状态,否则中国的实业恐怕“都要成外国资本家的掌中物”^{[4] 618};纵观当时之世界,要在“人家已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的条件下求得发展,“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有成”。李大钊指出,“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4] 604}。从早期领导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不只是发展实业、实现资本集中、改造中国社会的方式,还是落后的中国实现经济独立和赶超的必由之路。

早期创始人的这些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中得到了明确体现。1921 年,中共一大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5] 3}列为党的纲领,同时通过的党的第一个决议提出将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产业工会”是共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5] 6}。在后来的发展中,中国共产党关于工业化的目标以及工业化路径的选择逐渐清晰明确。

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提出了关于工业的方针，“为保障国家完全独立和民族解放起见，苏维埃政府将操在帝国主义手中的一切经济命脉，实行国有（租界、银行、海关、铁路、航业、矿山、工厂等）”，同时，苏维埃政府将“竭力促进工业的发展”^{[6] 89-90}。即使在反“围剿”时期，中共中央亦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飞速的跃进”以及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推进给予高度关注^{[7] 23-24}。但与苏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的中国不论是重工业还是轻工业的生产投资中，外国资本都占据着重要的甚至是垄断的地位，比如电力，美商上海电力公司的发电量相当于全国所有华资电厂发电量的总和^{[8] 83}；再如煤矿，从1912年到1937年间的多数年份，全国机械开采总产量的75%以上由外国资本控制^{[8] 86}。重要工业部门独立性的丧失使中国工业的发展面临着重重困难，完整的产业链条的构建无从谈起。

1940年初，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这篇经典文献为“中国向何处去”指明了方向：共产党人奋斗的目标是“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9] 662-663}；在这个全新的共和国中，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9] 678-679}。抗日战争又一次让中国人明白了发展工业的紧迫性，1944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的讲话中强调：“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10] 146-147}而随着战争形势的日益明朗，工业化的目标更为明确。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报告中再次强调：“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在新民主主义

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1] 1080-1081}“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共产党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在这一进程中，一直为中国共产党所强调的是经济命脉要由国家掌握，要“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改变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基础性工业部门以及工业资本集中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手中的局面^{[12] 1430-1433}。从创立初期直至新中国成立，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成为中国共产党日益明确的目标之一。

二、工业自给、统一计划与全民动员：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早期工业生产实践

经由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是一个终极理想，全面的工业化这一长远目标的实现需要以国家的独立与统一为基本前提。而在重重的围剿与封锁中，中国共产党早期建立起来的、处于分割状态的根据地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是生存和发展。“经济问题”从一开始就备受关注，是否具备“足够给养的经济力”直接关系到红色政权的存续^{[13] 57}。在将工业化的理想付诸实践之前，同时也是在争取生存和发展空间的压力之下，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开始了局部区域内的工业生产与建设实践，这些早期探索和尝试表现出对工业自给、统一计划、全民动员、发展公营工业等要素的高度强调与重视。这些实践中的探索为根据地、解放区财政经济的自给自足与持续壮大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也对后来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战争环境下的经济建设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业生产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开始了创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努力。初创时期的根据地大多地处山区、乡村，以小农经济为主，除了一些作为家庭副业的个体手工业之外，几乎没有现代工业，经济基础十分薄弱。根据地的工业最

初从为军事斗争提供保障的军需工业起步，1928年前后创办的塘边兵工厂、桃寮红军被服厂、红军印刷厂都是根据地早期的军需工业企业^{[14] 495-496}，根据地的工业生产主要围绕着军队需要、后勤保障以及当地百姓生活展开。动员群众“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13] 119}是根据地得以立足、革命战争得以继续的前提，而“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是根据地经济建设的中心^{[13] 130-133}。不论是中央苏区时期，还是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经济建设始终是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核心工作之一，因为物资供给、财政收入、人民生活皆依赖于此，“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成为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的总方针^{[11] 891}。在战争条件下展开的经济建设与工业生产具有鲜明的诉求和特点。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早期工业生产实践

第一，在自力更生中争取工业自给。努力争取但不依赖外援，以自力更生作为基本的立足点、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人自己的问题^{[13] 161}，这一很早就被明确提出并反复强调的指导思想影响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与建设的方方面面。从最初的湘赣边界开始，根据地始终面临一个难题，即包括食盐、布匹、药材、枪支弹药等物资在内的军民日用必需品的供给严重不足。自力更生既是发展理念，也是迫于需要的现实选择。中央苏区早期的兵工厂其主要的任务就是制造和修理枪支，以改善部队的武器装备、增加弹药供给，这是根据地军需工业的起点。

由于战争，各区域之间物资交流、商业贸易以及交通运输的中断几乎是常态，抗日战争开始后更是如此。20世纪40年代初，严重的经济封锁使得边区与国民党统治区域的货物流通“几乎完全停止”，包括布匹、棉花、铁在内的必需品被禁止运往边区，而边区的土产亦难以运出。处于这样的环境中，打破封锁，“求得在长期抗战中粮食以及工业品的自给”成为基于生存与发展的客观需要而必然形成的目标。发展各种工业是陕甘宁边区的头等要事，甚至机关和部队都需要组织起来“利用业余时间帮助发展工业，并保证工业品

的自给”^{[15] 18}。1938年，中央军委成立了军事工业局，以兵工厂为基础进行枪械的修配与机器设备的制造。军工局不仅着力于军事工业，还努力推进边区其他工业的发展，先后创办了玻璃厂、陶瓷厂、水力发电厂、炼铁部、化学厂等。不论是军工还是民用，目标都是实现工业品自给。1941年初，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计划明确提出：“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方针，在于使边区由半自给的地位，发展到自给自足的地位，以供应抗战和民生的需要，摆脱经济上对外的依赖性”^{[16] 122}，食盐、纺织、制革、纸张、石油、炼铁、煤炭、工具生产、化学工业等都是边区工业推动的重点。当然，这并不是陕甘宁边区独有的特点，在中央“发展自给工业”的要求下，“争取边区工业品的自给自足”是各个根据地的共同特征^{[17] 1}，只有如此“才能建立在经济上不依靠外力而独立自主的边区”^{[18] 502}。

这是中共中央一直坚持的方针，1944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的会议上又一次强调，“我们解放区的工业品，必须力求自给，必须争取于数年内达到全部或大部自给之目的。”^{[10] 240-241}工业品无法自给往往会产生连锁式的反应，不仅会影响百姓的生活，还会引起工农产品价格差的升高进而引起边区币值的波动^{[17] 10}，因而工业品自给成为根据地赖以发展的重要经济根基所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更大范围内推进工业生产成为可能并被付诸实践，东北地区的情况最具有代表性。相比于其他区域，东北地区解放的时间更早。1948年，东北地区由共产党直接经营和管理的工业就已涵盖煤矿、钢铁、铜矿、金矿、机械、电业、纺织、林业、造纸、化工等诸多领域，北满各工业区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不仅可以保障东北地区的需要，还有余力支持关内^{[19] 78-81}。“解放后东北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主要是搞工业”，以为支援全国和日后的工业化创造有利条件^{[19] 198}。由此可以看出，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依靠生产自给来实现真正的独立和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的工业生产实践所秉持的一个重要原则。

第二，克服本位主义，在“统一计划”中推动国营工业的发展。为了做到工业品自给，必然要大力发展工业生产，国营工业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支重要力量。“以军需工业为主要内容的自给性的国营工业是工农武装割据的特殊产物”，国营民用工业后来随之发展，1934年初中央根据地的国营工厂有32个，根据地拥有军工、纺织、造纸、制铁、榨油、煤炭、钨砂、陶瓷等多种工业^{[14] 530-532}。尽管工业生产的规模最初并不大，但在战争环境与敌人封锁下起步的根据地工业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对于计划性的高度重视。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强调，“工业的进行需要有适当的计划”，对国家经营和合作社经营的工业生产而言，“确切地计算原料的生产，计算到敌区和我区的销场，是我们每一种国营工业和合作社工业从开始进行的时候就必须注意的。”进行“有计划的有组织经济建设的工作”，这一主张与早期领导者强调采取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思想一脉相承^{[13] 133}。

抗日战争时期，边区的国营企业和中央苏区时相比有了更大的发展。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成立后不久即“决定成立一个经济委员会……任务是决定投资、计划、制定章程”^{[15] 7}。1942年，中共中央倡导的大生产运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工作方针都是在封锁加剧、根据地面临极大的财政困境的背景下提出的，国营工业生产依然带有一定自给自足的性质。为了解决当时国营工业企业生产分散、缺乏计划性、浪费资源的问题，毛泽东强调必须“建立全部自给工业的统一领导，克服严重存在着的无政府状态”，“所有国营工业，不论是属于哪一部门管理的，均须有一个统一的计划。在这个统一计划上，统一地筹划原料与粮草的供给，产量的定数，销路的衔接。……在这个统一的计划性上，要实行各业间的互相协助，消灭互相孤立甚或互相妨碍的本位主义。”^{[20] 706}在这一指导思想下，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扶持国营工业的发展，比如“统一棉花等工业原料的收购；限制边区可以生产的工业的进口；组织向外推销工业产品等”，边区还分行业进行企业登

记，“不仅全面掌握了工商企业的资金、设备、生产、经营情况，同时也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引导工商企业有计划的发展商品生产……开创了有利条件。”^{[21] 102-103}“在集中领导、统一计划、合理分工的原则下，继续发展国营经济生产”^{[21] 106}是边区当时确立的工作方针。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必须发展服务于边区需求和整体利益的国营企业，中共中央同时也强调国营工矿以及国营工矿的管理机构“必须企业化，反对机关化”，要“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即令某些纯粹供给性的企业，不便实行营业制者，也应实行定货制。”^{[21] 113}从这时起，如何实现国营企业更有效率而不是过于行政化的发展已受到关注。

对于经济建设计划性的强调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更加凸显出来。较早开始经济恢复与重建并担负着支援全国物资需求任务的东北解放区，在1947年8月即确立了全东北财政经济统一的方针^{[19] 175}，并将分散管理的工业企业“陆续收归国营，……逐渐建立了各个专业系统”，以为“集中统一、有计划有组织地大规模恢复重建东北工业”奠定基础，东北工业由此逐步走向统一管理^{[19] 179}。1948年起东北解放区开始编制第一个有关工业生产和建设的年度计划，这里的国营工业也最早进入了有计划地进行生产经营的阶段。1949年初东北开始着手于建立各级计划机关，因为“东北工业部领导的中心环节是加强工业建设的计划性与组织性，如果这个中心环节得不到解决，则其它问题都不好得到适当解决”^{[19] 104}。东北地区国营工业的计划管理模式后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从中央苏区时期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营工业逐步成长起来。国营工业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它的发展一方面是为了实现工业自给的目标，而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党一直以来所倡导的重要实业归国家所有、归社会共营的理念的贯彻。国营工业慢慢成为边区以及解放区的经济体系中的领导力量，也为后来国有经济体系的确立奠定了重要基础。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重申：“对内的

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治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12] 1433}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国有企业迅速发展，成为推进新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第三，全民动员与互助合作：工业生产中的群众路线。不论是最初的根据地，还是后来的解放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工业生产建设都是在人力、财力、原料、设备、技术等各种资源极其匮乏的基础上开展的，因而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全民动员的特点。在自力更生式的工业建设中，这种全民动员体现在有关生产的各个环节，资源的整合以及生产的改进都高度地依赖动员与发动群众。原料不足就通过收购、募捐等多种方式广泛动员群众进行收集；工具设备不足就因陋就简、就地取材自己动手制作；必要的能源紧缺就找出替代方法解决；专业人才不足，就通过师傅带学徒的方法逐步培养^{[14] 535-536}。

效率与技术的改进和提升同样要走群众路线，通过设立“吸收广大的工人积极分子参加”的生产讨论会以改进技术、推动生产被明确写进了根据地早期的工厂管理条例^{[22] 40-41}。从这时开始，“提高劳动热忱，发展生产竞赛，奖励生产战线上的成绩显著者，是提高生产的重要方法”^{[20] 708}。任何资源的短缺都必须主要依赖自力更生的方式解决。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解决技术人才严重缺乏的问题，陕甘宁边区已经开始了工业技术人才的初步培养，在边区的工厂中设置机械科、化学科、纺织科、制革科、造纸科、土木工程科、商业贸易科对招收的学员进行培训^{[15] 338-339}。这些培训的规模最初很小，但为边区的经济发展和工业生产提供了后备力量。

各种形式与内容的劳动竞赛、生产竞赛几乎不间断地开展，其重要性一再为中央所强调，20世纪40年代前半期在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等地广泛开展的赵占魁运动即是典型的例子。这些劳动和生产竞赛旨在通过调动和发挥全体劳动者积极性的方式推动生产效率的提升和产品质量的改进。有的边区通过了专门的奖励生产技术条例，

“凡边区人民对边区农业、工业、矿业、林业、畜牧业、水利等生产技术”有所贡献者，不论是生产技术的新发明或改良，还是“外货代用品的制造”或矿物的发现，均可获得荣誉与现金的奖励，边委会为技术研究试验者提供资金与试验条件支持^{[17] 4-5}。1948年以后，东北解放区虽然较早启动了较为系统的工业建设与计划管理模式，但这一过程中同样面临着设备、物资、技术等各种资源的匮乏。为了加快建设，东北解放区国营工业企业同样大力开展生产竞赛，从1946年的劳模运动到后来的生产立功运动，再到1949年的群众性创造生产新纪录活动、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等等，本质上都是为了在更大范围内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值得关注的还有工农业生产中互助合作的组织与推进。对生产合作社的倡导几乎与根据地国营工业的创办同时。在战争与封锁条件下陷于停滞的手工业生产，因根据地政府的支持和合作社的发展而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与国营工厂从军需工业起步不同，各类生产合作社从一开始就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涉及造纸、农具、煤炭、炼铁、铸锅、木器、烧陶、织布、缝纫、砖瓦、榨油等各个方面。抗战时期，边区有消费、手工业生产、运输、信用以及综合性合作社等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合作社成为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综合性群众组织”^{[23] 52-53}。合作社的组织与成长有效地配合了国营工业进而改变了根据地的经济结构，同时也为更广泛的群众动员创造了条件。

对群众的广泛动员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早期工业建设成为一场全民参与的工业建设，从而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各种稀缺资源的动员与整合，而对于全民动员的强调在1949年以后有增无减，群众路线在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结 语

20世纪中国推进工业化的进程充满波折，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实现中国工业化目标的唯一倡导

者，但毫无疑问是这一目标得以全面推进的最有力的践行者。20世纪初期的中国，是一个完全无法和经历了工业革命洗礼的西方列强相提并论的、落后的、以小农生产方式为主导的传统农业国。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于成立初期就提出了自己的经济主张：在国家完全独立的前提下实现生产资料与国家经济命脉的社会公有，不允许关系国计民生的实业部门操控于外国资本家手中。从最初“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主张，到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的纲领与“竭力促进工业的发展”的决议，再到后来“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目标，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已形成了日益明确的关于工业发展和工业化的设想。在近代以来的各种工业化思想与方案中，这一方案是独树一帜的。从经济层面来看，它反映了摆脱外国资本盘剥、争取独立发展工业乃至实现赶超的诉求，以国有经济为主体推动中国完成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设想在1949年以前已日渐清晰。从社会层面来看，这一方案亦是社会主义理想的有机组成部分，生产资料社会公有、采取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来发展实业的主张本身包含着对社会平等、公正的追求，其对中国社会此后发展的深远影响显然并不单纯局限于经济范畴。

1949年，国家独立与统一的基本完成成为新中国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社会主义工业化”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和成立初期提出的工业化方案一脉相承，“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核心内涵同样有两个：其一是工业化，中国要真正开始构建属于自己的相对完整且独立的工业体系；其二是社会主义，如同当时关于“大小仁政”的争论中所强调的，建设重工业本身仍是着眼于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没有完整强大的工业体系，中国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富强与发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工业生产实践中受到高度强调和重视的工业自给、统一计划、全民动员、发展国营工业等要素恰恰是后来新中国工业化建设中最鲜明的特征。正是以这些要素为支撑，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能够在遭遇西方严厉经济封锁、资源极度匮乏的条件下，推动资本等稀缺要素迅速向

基础最薄弱的重工业部门倾斜，而强大的资源动员与配置能力、工业战略与实践层面的国家主导为中国工业体系的快速成长创造了极其重要的条件。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这些早期探索与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亦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 ①黄群慧：《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及其历史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刘戒骄、孙琴：《中国工业化百年回顾与展望：中国共产党的工业化战略》，China Economist, 2021年第5期；李晓华、沈继楼：《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工业化：历程、经验与展望》，《当代财经》2021年第12期；李宗圆、伍山林：《中国共产党工业化思想百年演进》，《上海经济研究》2022年第3期；张申、李正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产业体系百年变迁》，《上海经济研究》2021年第6期；等等。一些以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著作中亦有相关内容的概要梳理。
- ②姬旭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国营经济的历史经验研究——以陕甘宁边区为例》，《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3期；武衡：《陕甘宁边区的冶金、燃料和化学工业技术》，《中国科技史料》1988年第4期；庞培法、荀玉森：《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下的石油工业》，《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等等。

参考文献：

- [1]赵晓雷. 中国工业化思想及发展战略研究[M].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0.
- [2]陈独秀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 [3]陈独秀文章选编: 中[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
- [4]李大钊全集: 第3卷[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 [5]中央档案馆, 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1册[G].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 [6]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 翻印. 苏维埃中国[M]. 北京: 北京市印刷二厂, 1957.
- [7]中央档案馆, 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10册[G].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 [8]严中平, 等.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G].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 [9]毛泽东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10]毛泽东文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 [11]毛泽东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12]毛泽东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1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4]许毅.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上[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15]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G].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
- [16]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G].西安:陕西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
- [17]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河北省档案馆,山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工商合作编[G].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
- [18]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2辑[G].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
- [19]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G].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
-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 [21]陕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陕甘宁边区的工商管理[M].北京:工商出版社,1986.
- [22]中华全国总工会政策研究室.中国企业领导制度历史文献[G].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86.
- [23]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7编[G].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 赵春】

A Study of the Party's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in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Prior to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WANG Danli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Xicheng, Beijing 100009)

Abstract: The CPC had developed an increasingly definite goal of futur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1949, as it put forth the program that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should be “owned by the public” on its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maintained that “entire national independence” be the prerequisite to promoting earnestl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ith the state ownership of important economic lifelines in the early 1930s, and held that “great efforts be made to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CPC, in its early leadership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laid much emphasis on elements such as industrial self-sufficiency, unified planning, nation-wide mobi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ublic industries, which later became the most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newly founded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and are also an integral par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Chinese modernization,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industrial self-sufficiency